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疫情，改變生活常態

HK人與事 東瑞

疫情下，家庭生活秩序和社會常態都被打亂了。一些我們過去無法接受的也學會接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也慢慢開始習慣。

最重要的是人際關係的變化。大家對生命的重視和珍惜，從來沒有像當下那樣現實和真實。每個家庭成員都希望彼此平安，任何一位染病，全家隔離，萬一發生不幸事件，探病、送別最後一程都可能被限制。因此親人間的防範、減少接觸，在這樣特殊年月，達到了最大的默契和諒解。幾乎每一個人，都史無前例地關心這牽涉到人類命運的疫情的走向，心中祈禱疫情早日過去，不僅僅是在地球的東方出現朗日明月而已。

再來是家庭的相處。各個家庭過去習慣的生活方式都幾乎被打破了。小兒女不習慣沒有同學一起玩的日子，還得學會上網課；年輕的家長以前兒女有大半天在學校讀書，許多事只讓傭人姐姐代勞，這一次在家辦公，就也要面對和子女相處，有些人發現原來自己還不是合格的父母，育兒完全是一門新的藝術。像我這類幾十年前就自己創業的自由職業文化人，變化也不小。

一場疫情，加上自去年中以來長達八個月的暴亂，在行業內，前方不少書店被砸壞了，真是觸目驚心；後方的出版社人員一年多來深居簡出，「顆粒」無收，血本無歸，暗自神傷。過去的忙忙碌碌，換來彈盡糧絕，坐吃山空。那種很少在家燒菜煮吃的、攜手在外面解決午晚餐的閒情和浪漫已經不再，老伴將快要生疏的廚藝又重拾起來；我一類的菜市陌生客，被迫要分擔一半責任，到菜攤買菜，在超市掃貨。有不少微信群組，每天都轉美食、糕點、餸菜的圖片，以展示廚藝。我們兩人世界，夠吃就好，味美就好，她燒的都是來自兩位母親傳授給她的私房日常菜。因為到市場多了，過去常常混淆的蔬菜已熟悉，不再五穀不分了，像青葱、京葱、芫荽、芹菜、西芹、韭菜之類，以前我常常分不清而鬧笑話，疫情助我橫掃「蔬菜盲」。另外，看新聞得知年紀偏大的確診長者死亡率高，我們都會比以前更加關切另一半的生命安危，充分衡量誰出門較安全，才決定誰外出。

以前常常說「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希望全世界都能走遍。如今靜待疫情平緩，香港的關口重開，最放心去遊覽的還是祖國大陸。再說了，只論我們居住的香港，外面的世界不是真精彩了，而是真冷清。餐廳不再爭位置，一看人多會猶豫是否進去。各種排隊，包括購物、地鐵進車廂、銀行入賬取款，人與人之間都保持相當的距離。最妙的是地鐵車廂，以前總是有三姑六婆高談闊論，現在像一齣大默片；巴士裏，過往也不時出現民間演說家，如今口罩封嘴，人再多也是靜悄悄的。熱戀男女以前在大庭廣眾的交通工具裏旁若無人地擁吻，現在幾乎看不到了。

一場疫情，威力太大，奪命之外，令每個人的生活、習慣發生天翻地覆的改變，社會的常態和秩序也應時而變。

追念霍啟昌教授

人與事 劉蜀永

獲悉港澳史專家霍啟昌教授於九月十二日在澳門病逝，深感意外和悲傷，不禁回憶起和他交往的種種往事。我和他初次見面是在一九八三年四月。他作為香港的特邀代表，到北京出席中國史學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到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我的老師余繩武所長要我參與接待工作，並陪同霍教授參觀故宮博物院。當時我們研究所剛剛開始香港史研究，余老師邀請霍教授參與合作研究，他欣然同意。

當時是國家改革開放初期，信息渠道不甚暢通。霍啟昌教授提供了大量海外香港史研究的信息，使我們獲益匪淺。正是採納了霍教授的建議，中國社科院動用三萬英鎊外匯，從英國購買了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129系列縮微膠卷，內容是十九世紀到一九五〇年代香港政府與英國政府的來往文書。隨後，霍教授又在香港替我們代購了一台十分先進的讀印機，用以閱讀和影印縮微膠卷。這些極大地提高了我們香港史研究的質素和效率。

霍啟昌教授應邀參加了近代史所香港史課題組《19世紀的香港》和《20世紀的香港》兩本學術著作的編寫工作，分別撰寫了「英國佔領前的香港地區」和「香港與辛亥革命」兩章書稿。他還多次對兩本書的編寫提出不少建設性的意見，比如如何客觀、公正地使用歷史檔案，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一九八五年三月至五月，近代史研究所香港史課題組首次到香港收集資料和考察。成員有我的老師劉存寬教授、同事楊詩浩教授和我。霍啟昌教授替我們做了極其周到的安排。首先是請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作為接待單位，又安排我們到港大孔安道圖書館、布政司署圖書館收集資料。他陪同我們參觀香港博物館，到澳門考察。他又請孔安道圖書館主任楊國雄先生駕車陪同我們考察曾氏大圍、侯王廟和九龍城等地。當時國家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我們的出差經費很少。霍教授替我們精心安排，通過陳坤耀教授安排我們住進了明愛中心宿舍。那裏離香港大學很近，住宿費又便宜，記得一個房間一天的住宿費僅為八十港元。

霍啟昌教授還積極推動海峽兩岸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一九八八年，他作為籌備委員會主席，在香港大學主持召開了第一屆中國海關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內地的陳詩啟、張寄謙和來自台灣的張存武、趙淑敏等學者聚集一堂，我也應邀出席。海峽兩岸學者初次相逢擦出的火花和趣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霍啟昌教授著述甚豐。他還參與過《香港史新編》的編寫工作，並著有《香港與近代中國：霍啟昌香港史論》、《香港史教學參考資料》、《港澳檔案中的辛亥革命》、《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Hong Kong and the Asian Pacific（1840–1900）》、《Lectures in Hong Kong History》、《Estudos Sobre a Instalacao dos Portugueses em Macau》等。他的逝世是港澳史學界的重大損失。然而，學術之樹長青。他雖然遠去，卻留下了彌足珍貴的學術遺產。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如是我見 嚴詩喆

疫情期間，足不出戶，在家欣賞各類影視節目，似乎成為人們一項必不可少的消遣。在視頻網站的推送提示下，筆者忙裏偷閒，有機會「重溫」不少影視經典之作。其中，首播至今已達十年之久的TVB電視劇《巾幗梟雄》系列給本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第二部《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中秋佳節將至，劇中人物所傳達的情誼與默契——「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適用於當前語境，平添了層次豐富的共情維度。

▲電視劇《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海報 資料圖片

《義海豪情》的故事以大時代為背景，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抗戰時期，再跨越新中國建立三十年、全球冷戰階段。跌宕起伏的歷史語境，為劇情鋪展、人物塑造、情感渲染、效果疊加，創造了可能、奠定了基調、進行了加持。在此，「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戰亂中的人們，對家人、朋友，甚至愛人的約定、默契、祝福或承諾。歷經同生共死的淬煉，人與人之間的情誼提純至通透、徹悟的境地，不求「朝朝暮暮」，只求各自安好、有緣再會。

在八年抗戰中，男女主角多次出生入死，建立起深厚的情誼和默契。於是，與同歷生死的街坊鄰裏相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舉杯話別過後，二人決定一同前往美國檀香山。身處亂世，他們在出走前夜竟意外失散於槍林彈雨中，自此生死兩茫茫。女主獨自抵達檀香山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華文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寄意，希望終有一天能找到這位生死與共的知己。與此同時的另一面，男主自從被炮彈擊中失憶後，留在了內地，後來逐漸恢復記憶，嘗試各種途徑尋找女主未果。直至改革開放，女主有機會回到內地，重遇失散三十年如同親人般的街坊鄰裏，終與這位有着生死之交的男主重逢。戰爭無情，人間有愛，在此，「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概括、詮釋了生於亂世的人們深厚的情誼。

每每看到與戰爭相關的影視作品，我們才會恍然大悟——生於和平年代是多麼值得感恩的幸事。戰爭固然殘酷至極，而當前的疫情也不見得仁慈多少。不論科技如何進步，通訊、交通如何發達，生命所面臨的未知與挑戰卻從未缺位。這場全球的抗疫之戰，竟讓我們在和平年代更能與亂世之不確定、不安、無助等景況共情。歲月靜好的年頭，在中秋佳節向親朋送上一句「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的問候，顯得多麼詩情畫意，久而久之，卻似乎變得欠缺新意。

殊不知，不論置身戰爭、亂世，還是處於疫境、未能與親朋團聚，「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人與人之間，對於彼此多麼恰到好處的問候、禮輕情重的祝福！可以說，這是心意相通的人們、彼此之間的默契。

出於求學的需要，近年的中秋、乃至新春佳節，我都鮮少與家人共聚。幸好生於二十一世紀，通訊技術發達，即便相距甚遠，仍能隨時隨地與親朋保持聯繫。今年中秋，我將仍在南洋星洲度過，盼與友人聚首，對月言歡，聊慰疫境之下的種種辛酸與不易。對於更多未能相聚的親友，不論置身同一座城，抑或相距千萬里，惟願平安喜樂、各自珍重，舉杯對飲，共賞一輪明月。

蘇軾的「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中國古代文學寶庫中的經典，歷久不衰地傳頌千年，啟發後世無數的文藝創作與呈現。不論烽火歲月，抑或疫境當前，此一名句聯同中華文化寶庫中浩如煙海的礦藏、遺產，注定成為這一民族世代相傳、最為珍貴的財富。「華」作為一種民族身份，與其所內涵、代表的歷史文化資源一道，超越時間、地點、國界、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等局限，為認同該身份的中華兒女所共用。這份文化遺產，是中華兒女直面國際時局變遷、人類命運跌宕等挑戰或艱險之際，屹立不倒的底氣，通透徹悟的智慧，更是該民族兒女之間獨特的默契或「通關密碼」。

世代相傳，歷久彌新，耳熟能詳如「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依然在每一次的應用、再詮釋、再創造中，被賦予更豐富的意涵，為民族文化庫藏持續注入新血液、新靈感、新能量，在可預見的未來，定將生生不息……

抗美援朝紀念館新館開放

市井萬象

九月十九日，改擴建後的抗美援朝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位於遼寧丹東鴨綠江畔英華山上的抗美援朝紀念館，是全國唯一全面反映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和抗美援朝運動歷史的專題紀念館。它始建於一九五八年，二〇一四年六月進行新一輪改擴建。據介紹，抗美援朝紀念館現有館藏抗美援朝文物二萬餘件，各類抗美援朝資料三萬餘份。

中新社

讀《我愛秋風勁》

香港隨筆 張茅

收到石中英寄來著作《我愛秋風勁》，打開包裹，已被精巧的設計吸引。

《我愛秋風勁》出版於一九七五年，今次的新版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該書被看作「六七文學」，這一點我和一些朋友認同，雖不是每篇文章涉及「六七」，直接涉及的部分文章寫得令人動容，因作者的身份是「六七」中的少年。這樣含有「六七」內容的作品在內地出版，還是首次，使人期待，故四十五年前的作品，不失其新。

最初出版時，全書六十篇散文是石中英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刊於報紙專欄，以二十歲出頭寫他十餘歲少年的經歷。多篇文章如今再讀，仍甚有現實意義，教人深思，筆者在此分享一二。比如《野孩子》一文，反映生活在港英政府殖民統治下的香港青年，帶着身份認同的迷惘，作者就讀金文泰中學，親迎港督戴麟趾視學，他在「天佑吾皇」的英國國歌聲中，陷入身份的疑惑，「我到底是殖民地的小英國人？還是個被祖國遺棄的中國人？我們是否生而成為『野孩子』？」上世紀七十年代，大專學生興起「認識祖國，關心社會」運動中，作者看到他的好友擺脫「野孩子」及「無根一代」的困擾，做「祖國的親孩子」。作者從身份中醒悟，擁抱吾土吾民，以「保釣運動」中犧牲的陳毓祥為原型，寫出《野孩子》。

《那一夜，我們歌唱》，獄中悲壯的一幕，是全書令人讀來最震撼的一篇。監倉裏的少年，焦急等待這指定的時間到來，整座監獄的「倉友」放聲高歌。「驀地，在萬籟中，一個雄壯的男高音響起來了……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獄中歌聲中一少年，朋友都知道是作者石中英。在後來他的一些文章中看到一段話：「自此以後，五月的歌，便成了我生命的歌。為理想而歌，青春無悔。」那年他十七歲。

筆者認識石中英是在《新晚報》編輯部，他出獄不久，報章常見「YP」（Young Prisoner，少年犯）的報道，印象中他身材瘦削，臉色青白，眼鏡下眼色朦朧的一位青少年，每星期來編輯部一兩次，獨與副刊編輯黃開福接觸，不苟言笑，放下稿件便離去。之後，知道他是活躍於學界的石中英，上編輯部來參與報社《學生樂園》組稿及編輯，只見其身影來去。那時「六七」過了尾聲，報社剛要調整內容，革新版面，忙於事務，本想與他打招呼的機會錯過了，因此只可說是遇面。

再次遇面是在沉寂三十多年後的二〇〇〇年中段，這時石中英是一位商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為國家引入外國電視機產業先進技術，筆者和他的交談真正開始，知道他決定重返文化工作，推動其心中的「六七文學」，這時，他有足夠的能力從事於這些活動。這些年他忙於出版、音樂創作、舞劇、音樂劇、話劇及拍攝電影，把《野孩子》的內容搬上舞台，《大橋抒懷》編成集體朗誦而演出，製作當年的紀錄片，創作音樂劇《那年五月》，並投資拍攝電影《五月》，舉行多次專場放映，引起廣泛注意。二〇一八年，他把交響樂《鳳凰傳奇》帶到音樂之都維也納，在卡爾教堂演出。

《我愛秋風勁》由不同故事描述一個香港「書院仔」如何從身份迷惘成長為愛國青年，曲折、豐滿，帶着一些悲壯，因而可讀性高。內地青少年生活在關懷滿載的環境，也有不一樣的成長過程，面對大國博弈的國際環境，面對世局劇變，不少人在驚異中醒來，反思個人在國家安危中的擔當。在筆者看來，此書的內容能為他們帶來啟迪。